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 1978—2020年

杨 子¹ 诸 培 新² 郑 景 丽¹

(1.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1331; 2.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本文系统搜集了1978—2020年公开发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本,利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方法,首先从发文时间、政策主题两方面归纳政策总体发展趋势,其次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匹配视角分析了政策变迁的具体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发展经历了“制度创新—政策突破—逐步完善—全面推进”四个时期,其政策目标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政策工具结构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的错配现象。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献量化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3-0023-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303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1],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体系不健全等问题^[2]。如何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合理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体系,通过政策工具的有效组合及匹配实现政策扶持的多样性和有效性,调整和改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结构和相关制度安排,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的新要求,是亟需思考的问题。

收稿日期:2021-03-26

作者简介:杨子(1989—),女,江苏南京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经济与政策。

诸培新(1968—),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土地经济与政策、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

郑景丽(1976—),女,四川仪陇人,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基金项目:2020年度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0XLB032);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社区营造助推精准脱贫的机理建构及路径改善问题研究”(19XMZ095)。

政策制定有赖于科学有效的政策研究。现有的政策研究多关注于政策实施的事后效果,以此考察政策制定的合理性^[2],较少从政策文本本身进行考量。国内学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政策研究可以分为整体视角、对比分析和实施效果评价三类。第一类从整体视角研究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体系。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被认为是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核心^[3-4]。但现阶段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依然存在供需结构不合理^[2]、公益性服务缺位^[5]、经营性服务发展缓慢等问题。第二类通过比较分析,借鉴国外经验来完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研究。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的农业服务体系建立较早,在外部环境、市场发展等方面相对成熟,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支撑^[6-7]。第三类从政策实施效果视角评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效应。政策激励能够提高农技服务的效率^[8]、提高农民收入^[9],但在政府购买农技服务中仍然存在购买绩效不佳的问题^[10]。

可以看出,关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研究多关注于政策的存在问题及实施效果,而对政策文本本身的研究涉及较少,并且对政策本身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近年来,以政策文本为对象采用量化分析方法开展研究,逐渐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热点^[11-12],更客观、精准地描述政策变迁的过程,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为此,本文系统收集整理了我国 1978—2020 年国家层面实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献的外部属性特征和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从政策时序特征、政策主题变化梳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变迁及阶段性特征,以“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匹配视角总结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变迁情况,揭示政策的目标人群的嬗变过程,以期丰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政策研究,并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进行量化分析。首先,收集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及各部门颁布的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梳理有效政策样本;其次,建立政策发文时间、发文机构字段,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政策的时间分布情况及阶段性特征;再次,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采用词频统计及共词聚类分析,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主题及其潜在关系,进而考察政策聚焦的变迁情况;最后,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及目标人群的分类,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进行逐条编码,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演进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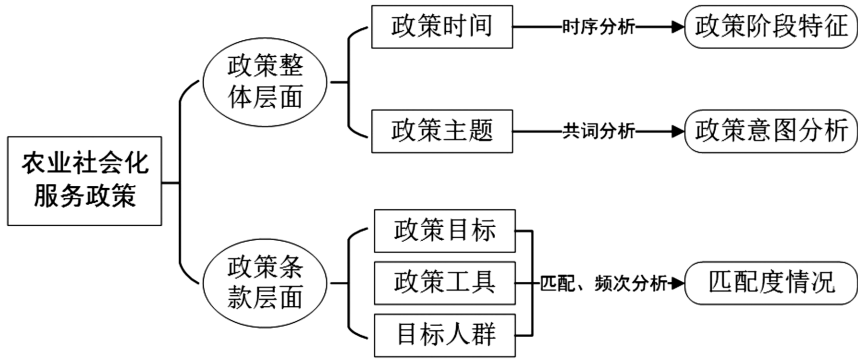


图 1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本分析框架图

(二)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献为研究对象,选取的政策文本均来源于公

开数据资料,为了确保选取政策文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收集策略:首先,以“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服务”等作为关键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委官方网站及第三方大数据平台“白鹿政策”数据库进行直接检索,政策样本仅选择国家层面的政策信息,不包括地方政府颁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本;其次,利用政策文本、文献资料中政策之间的引用关系,通过回溯检索方法对已检索政策进行补充;最后,阅读收集到的政策文本,最终遴选出1978—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各部门颁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本75件,其中包括法律、条例、意见、办法、通知等政策内容。

(三) 构建类目与编码

结合研究目的,对选取的政策文献进行两个层面编码:第一层面为政策整体层面,以政策文本整体为单元进行编码,主要字段包括发文时间、文件号、政策名称、发文单位、主题词及政策全文;第二层面为政策条款层面,以政策文本中每项涉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款项为单元进行编码,主要字段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及条款描述。

1. 政策主题

借鉴文献计量学对关键词的研究分析方法,在确定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主题词的基础上,通过词频统计、共词分析探究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关注度高的主题词及其潜在关系。共词分析是通过统计两个主题词同时出现在一个政策文本中的次数,找出词对之间的亲疏关系^[13-14],具体分析步骤为:(1)抓取主题词。借助NLPiR大数据搜索与挖掘共享平台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进行主题词提取,以政策整体为编码单元,为每份政策文本确定4—5个主题词。(2)确定高频主题词。通过词频统计确定出频率较高的主题词。根据Donohue的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 $T = (-1 + \sqrt{1 + 8x}) / 2$,计算得出阈值为11,但由于词频大于11的主题词为“农业服务、合作经济、科技创新、规模经营、服务组织”,不能很好的概括政策主题,因此本文选取词频大于6的主题词为高频主题词。(3)建立共词矩阵。统计一组高频主题词在同一份政策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构建高频主题词的共词矩阵。(4)共词聚类分析。聚类运算分析共词矩阵中各个主题词间的距离,判断政策主题变化。

2. 政策目标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在于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表示的是为了保证粮食产量,有可能以忽视成本—利润率、牺牲生态安全为代价,增加粮食产量,以保证我国人口的粮食消费;农业增效主要是在考虑的成本—收益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农民增收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九亿农民的收入问题;生态安全是在发展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时,充分考虑可持续性,不以环境为代价。

3. 政策工具

本文采用Rothwell和Zegveld的分类方法^[15],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工具分为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三类。供给面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对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支持,扩大和改善发展农业服务的要素供给,提高农业服务的基础建设,从而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形成、创新发展。需求面政策工具是指政府从农业服务需求市场角度考虑,通过政府购买、价格补贴等措施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拓展和稳定农业服务市场,反作用于服务供给主体,激发供给力度。环境面政策工具主要指政府搭建适合农业服务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规范竞争行为、优化相关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农业服务发展。

4. 目标人群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我国农业生产的关注点在不断发生变化,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分散

经营的普通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1988 年从法律层面认可土地使用权流转,逐渐形成规模经营主体。农业生产基本单位的变化,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中也有所体现,因此本文所指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目标人群包含分散经营的普通农户及规模经营主体。

二、结果与分析

(一)政策整体层面

1. 政策发文时间的时序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开始的,从政策文本的时序分析来看,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沿着“制度创新—政策突破—逐步完善—全面推进”四阶段的轨迹发展,主要包括了三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 199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概念,正式开启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新局面;二是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促进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协调发展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市场化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三是 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提出要积极推广“既不改变农户承包关系,又保证地有人种的托管服务模式”,发展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进行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图 2 绘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演进历程,从政策发布时序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数量随着时间变化呈增长态势,1978—1989 年呈缓慢上升状态,1990—2007 年基本处于平稳状态,2008—2013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开始逐渐增多,2014—2020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开始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在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带动政府出台了多项关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政策,政策发布数量的密集程度显著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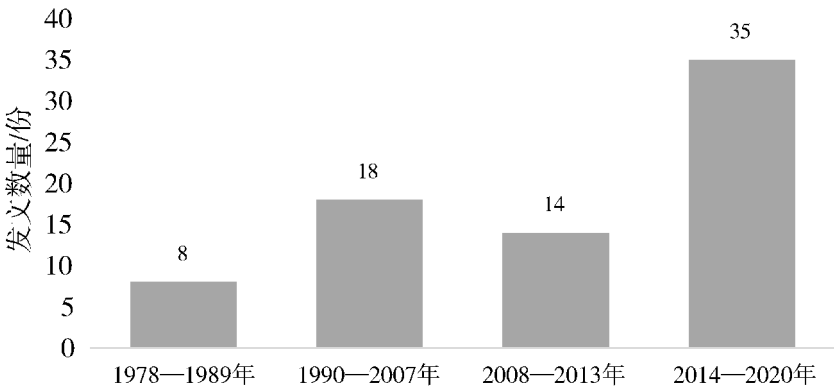


图 2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发布时序分布图

2. 政策主题分析

根据收集的 1978—2020 年的政策样本,提取政策主题词,经过规范化处理,得到高频主题词,涵盖了四十二年间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关注重点。根据高频主题词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主题词的共词矩阵,反映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土地规模经营的亲疏关系,如果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土地规模经营这一对主题词同时在多项政策中出现,则说明这对主题词的关系紧密。由表 1 所示,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土地规模经营两个主题词的共现次数最高,达 13 次。

表 1 共词矩阵

高频主题词	产业结构	服务组织	土地规模经营	合作经济	经济体制	科技创新	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社会化服务	现代农业	市场	粮食安全	总计
产业结构				4		2		4	2	5		17
服务组织			8	5	1	6	1	13		2	1	37
土地规模经营		8		3		5	4	13	1	1	3	38
合作经济	4	5	3		2	4		11	1	4	2	36
经济体制		1		2		4	1	5				13
科技创新	2	6	5	4	4		4	13	2	1	2	43
农产品质量安全		1	4		1	4		4			3	17
农业社会化服务	4	13	13	11	5	13	4		5	3	3	74
现代农业	2		1	1		2		5		1		12
市场	5	2	1	4		1		3	1		1	18
粮食安全		1	3	2		2	3	3		1		15
总计	17	37	38	36	13	43	17	74	12	18	15	320

为了更加科学的反映主题词间的关系,将共词矩阵变换成相关矩阵导入 SPSS 中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如图 3 所示,将高频主题词按各自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五类:(1)科技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现代农业、服务组织、土地规模经营、合作经营;(2)经济体制;(3)产业结构、市场;(4)粮食安全;(5)农产品质量安全。结合共词矩阵及共词聚类分析,可以看出与核心主题词“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系密切的主题词有 5 个,即科技创新、现代农业、服务组织、土地规模经营、合作经营,其中我们最关注的土地规模经营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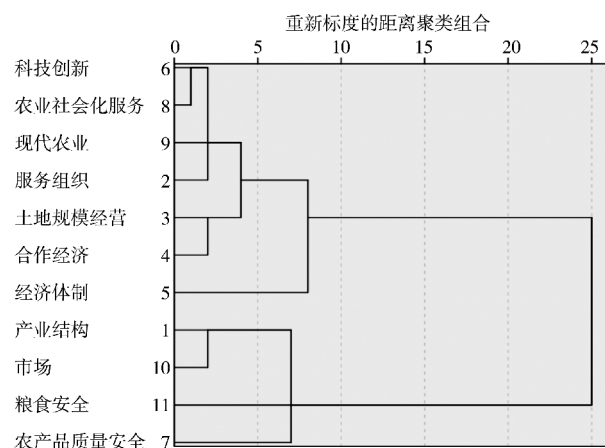


图 3 平均联结(组间)树状聚类图

(二)政策条款层面

1. 政策目标

总体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两项目标占总体目标的近 80%,粮食安全占总目标的 13.45%,生态安全占总目标的 7.34%。

分阶段来看,不同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侧重点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第一阶段(1978—

1989 年)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该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主要是粮食安全,但未考虑到农业生产的生态安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社会化服务替代人民公社帮助分散承包户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第二阶段(1990—2007 年)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是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小康目标,促进农业现代化,该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粮食安全为主。进入 21 世纪后,农民增收成为政策目标的重点,另外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农业生产的生态安全目标逐渐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2008—2013 年)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是稳定粮食生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该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是农民增收、生态安全。第四阶段(2014—2020 年)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要求是将普通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行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建设现代农业,该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生态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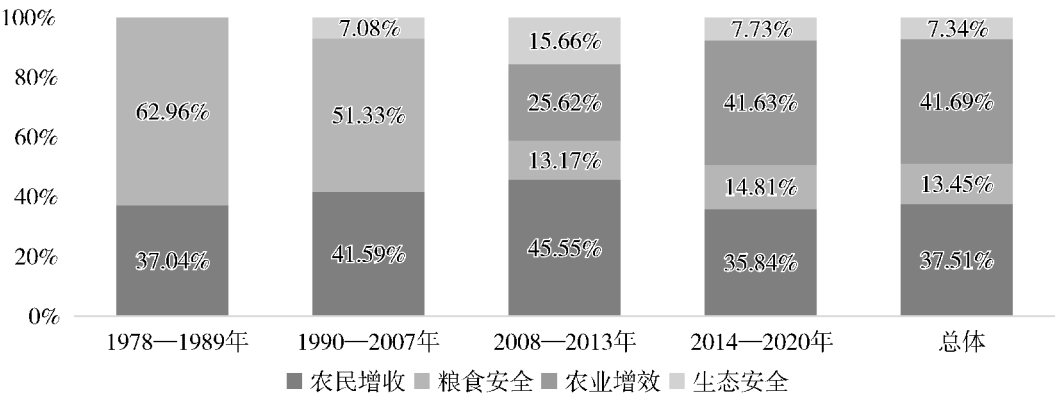


图 4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目标

2. 政策工具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工具维度的频数统计如表 2 所示,在所有被编码的政策条款中,环境面政策工具占 43.89%,其中法规管制类和金融支持类工具运用较多,技术标准及目标规划类措施较少,法规管制能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金融及税收的优惠政策也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但若缺乏目标规划及技术标准,将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未来发展失去规划,在产业发展中缺乏统筹性和标准性,便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供给面政策工具是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占政策总量的 36.75%,其中政府主要采用财政拨款类政策工具,人才培养占比较低,表明政府在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较多进行财政投入,而对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投入较少。使用最少的是需求面政策工具,仅占政策总量的 19.34%,并且需求面政策工具中类型分布差异较大,示范工程是政府使用较多的需求面政策工具,占总需求面政策工具的 78.36%,而政府购买、用户补贴、价格指导类工具的使用较少。

分阶段来看(如图 5 所示),1978—1989 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工具配比最不平衡,供给面和环境面的政策工具使用过溢。到 1990—2007 年的第二阶段,供给面和环境面政策工具比例趋于降低,需求面政策工具有所提升。2008 年之后,政策工具相较于前两个阶段更趋于平衡,但需求面政策工具比例依然偏低,存在拉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第四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工具有所调整,虽然该阶段较前三个阶段较为平衡,但需求面政策工具仍有不足。

表 2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工具频数统计表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供给面	财政拨款	112	34.46%	325	36.76%
	人才培养	61	18.77%		
	信息支持	72	22.15%		
	基础设施	80	24.62%		
需求面	政府购买	14	8.19%	171	19.34%
	用户补贴	12	7.02%		
	示范工程	134	78.36%		
	价格指导	11	6.43%		
环境面	金融支持	106	27.32%	388	43.89%
	法规管制	212	54.64%		
	目标规划	33	8.51%		
	技术标准	37	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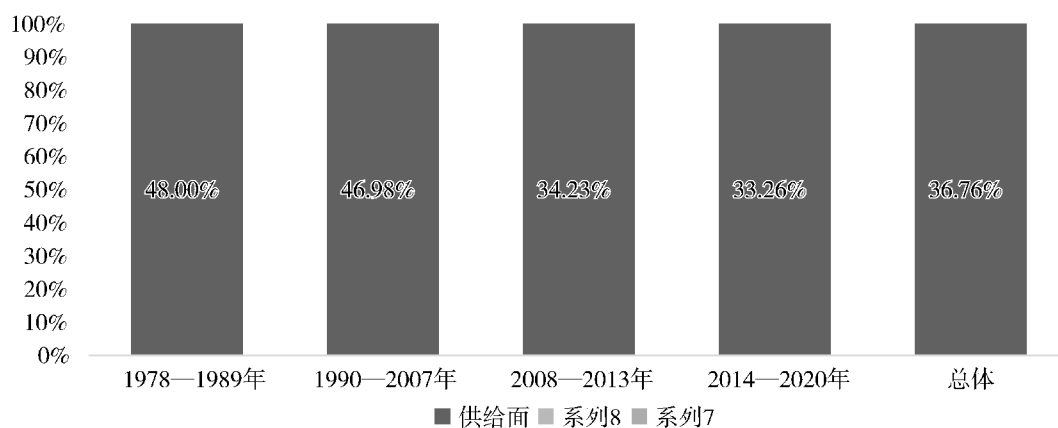


图 5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工具分布图

3. 目标人群

总体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目标人群包括分散经营的普通农户以及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两者分布较为平均,其中普通农户占总目标人群的 52.73%,规模经营主体占总目标人群的 47.27%。

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1978—1989年)的政策目标群体主要为小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村出现了一批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专业户,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成为这类生产者的重要诉求。因此在这一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服务群体是一家一户的联产承包户,即农户群体。在1983年之前,法律和政策均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1984年首次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但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方面,并未着重强调服务于土地集中的种田能手。

第二阶段(1990—2007年)的政策目标群体以农户为主,规模经营主体为辅。在第二阶段前期,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依靠科技增加农业投入从而有效稳定地发展农业,为广大农户提供急需的服务项目,主要目标群体仍是分散经营的农户。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五连增”,农业发展的重心从原先单一追求产量的生产模式向多样化、高质量生产发展,推行土地规模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成为转变农业生产模式的抓手,因此在第

二阶段的后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为配套土地规模经营而服务,政策的目标人群也有所偏向于规模经营主体。

第三阶段(2008—2013 年)政策目标群体为规模经营主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着重提出要根据不同的经营主体需求提供菜单式服务,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提供系列化、专业化服务,发展配套于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四阶段(2014—2020 年)政策目标群体综合考虑了规模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社会化服务需要“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目标群体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规模经营主体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承包式等服务模式”(《农业部关于切实做好 2014 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满足不同农户的经营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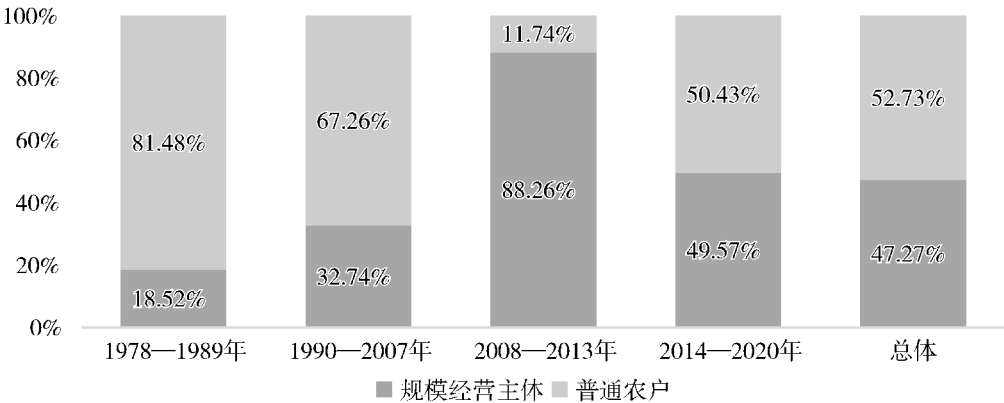


图6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目标人群分布图

4. 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匹配分析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显示,总体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策工具主要以环境面、供给面政策工具为主,政策工具配置不尽合理;政策目标人群包含了分散经营的普通农户以及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对目标人群的政策配置较为均衡。

分阶段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从第一阶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生产力,到第二阶段稳定粮食生产、注重粮食安全,过渡到第三阶段着重考虑农民增收、关注生态安全,发展到第四阶段的增强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民收入以及保障生态安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目标不断完善。为实现这些政策目标,政府使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使用中存在不均衡性问题,政府使用较多的是供给面及环境面政策工具,而对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十分有限,第一阶段中几乎未使用需求面政策工具,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不断调整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到第四阶段,虽仍以环境面、供给面政策工具为主,但需求面政策工具比例有所上升,达到较为均衡的使用比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主要考虑的目标群体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也有变化,从第一阶段以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为主,发展到第二阶段逐渐考虑规模经营主体的需求,第三阶段以规模经营主体需求为主,到第四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目标群体包含了规模经营主体以及分散经营的农户,更加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国情。

表3 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汇总表

指标	总体	第一阶段 (1978—1989 年)	第二阶段 (1990—2007 年)	第三阶段 (2008—2013 年)	第四阶段 (2014—2020 年)
政策目标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主	以粮食安全为主	以粮食安全、农民增收为主,开始关注生态安全	以农民增收为主,逐步考虑农业增效及生态安全	以农业增效为主,考虑农民增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几个方面
政策工具	环境面、供给面政策工具为主,较少使用需求面工具	供给面、环境面政策工具较多,几乎未使用需求面工具	供给面、环境面政策工具为主,需求面政策工具较少	环境面、需求面政策工具有所提高,供给面政策工具有所减少	环境面政策工具偏多,总体相对平衡
目标人群	规模经营主体与小农户较为均衡	以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为主	以小农户为主,逐步考虑规模经营主体需求	以满足规模经营主体需求为主	同时考虑到规模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需求

三、讨论与结论

政策文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能够总结和凝练出政策演变的规律,有助于更为科学的理解政策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以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其政策演进过程和政策变迁特征进行归纳与分析,研究发现: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整体层面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的数量随着时间变化呈增长态势,但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多以通用政策的形式发布,仅在后期阶段,以部分专项政策形式出现,政策的指向性较弱,在政策执行时易造成混淆和误解,降低政策的可操作性。因此,政府应逐步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专项政策,在“专用+通用”两个维度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体系,既要确立以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为核心的专用政策群,也要围绕核心政策从培育服务主体、明确服务内容、保障服务质量等角度确立辅助政策群。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工具来看,政策工具结构不尽合理,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过溢,需求面政策工具使用较少,社会拉动力不足,导致政策工具的协调性和灵活性不足。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大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政策机制相对单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易出现衔接性差和政策失灵的问题。从不同农户的生产需求及不同生产类型出发,进一步扩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满足不同农户对种植、养殖、植保、农机、技术、销售等环节的需求,推动农业服务主体积极尝试“互联网+”的服务模式,建立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目标人群”匹配的视角来看,现阶段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存在某种程度的错配现象,需求面政策工具供给不足,且多集中于示范工程类,政府购买、用户补贴等政策工具的运用比例小,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拉动力较弱。使用需求面政策工具能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不确定性,激发农业服务主体的创新供给,因此,政府在持续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发展的同时,应给予需求面政策工具更多关注,从相对单一的工具手段向综合手段转变,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实施效率。

[参 考 文 献]

- [1] 张红宇,张涛,孙秀艳等.农业大县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四川省的调研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5(12).
- [2] 高强,孔祥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演进轨迹与政策匹配:1978—2013年[J].改革,2013(4).
- [3] 芦千文,姜长云.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 [4] 冯小.多元化农业经营背景下农业服务模式的创新与农业发展道路——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5] 王定祥,李虹.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配套政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6(6).
- [6] 樊亢,戎殿新.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兼论农业合作社[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
- [7] 金兆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外借鉴和基本思路[J].当代经济研究,2002(8).
- [8] 贾晋.中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政策模拟与优化——基于基层推广机构行为视角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9).
- [9] 穆娜娜,孔祥智,钟真.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创新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基于多个案例的实证分析[J].江海学刊,2016(1).
- [10] 刘新智,李奕.政府购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6(5).
- [11] 黄萃,任弢,张剑.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5(2).
- [12] 吴宾,杨一民,娄成武.基于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政策文献综合量化研究——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政策为例[J].情报杂志,2017(8).
- [13] CALLON M, LAW J, RIP A.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M]. The Macmillan Press, 1986.
- [14] 储节旺,郭春侠. EXCEL 实现共词分析的方法——以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知识管理研究为例[J].情报杂志,2011(3).
- [15]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 Longman, M. E. Sharpe,1985.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Policy Texts from 1978 to 2020

Yang Zi¹ Zhu Peixin² Zheng Jingli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benefits from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system. 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gathered the policy documents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from 1978 to 2020. By using document measurement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irstly,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policy development trends from two aspects of policy-making time and policy theme, and secondly, this paper ha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goal-policy tools-target population” matching.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field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the policy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system innovation, policy breakthrough, gradual improvement,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policy objectiv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 changes, the policy tool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policy goals, policy tools and target popul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e;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policy; documents quantitative

[责任编辑:左福生]